

# “澳門學”研究回顧與建議 (1999—2019)

劉 軍

**[摘要]** “澳門學”的提出已經有三十年了，但似乎又是一個新概念，回顧發展過程並對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認真梳理是有意義的，希望在發現問題的同時又推動其走向深入；多元、交叉、融合、並進，不僅是澳門文化的特點，也是“澳門學”研究的特點，但研究範圍和研究重點應該分階段推進，不會一蹴而就；任何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語境，處理好內外關係有利於澳門和“澳門學”健康發展，本文就不同關係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 澳門學 研究綜述 研究範圍 內外關係

本文以中國知網（CNKI）為平台，以“澳門學”為切入點，對相關文獻作出回顧和綜述，希望盡快推動“澳門學”的研究走向深入。

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陳樹榮、楊允中、黃漢強等一批澳門學者就提出要建立“澳門學”並召開了專題學術研討會。先後有黃漢強（1989）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sup>①</sup>常紹溫（1994）的《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sup>②</sup>陳樹榮（1995）的《建立澳門學，促進澳門研究》、<sup>③</sup>吳志良（1996）的《舊話重提“澳門學”》、<sup>④</sup>湯開建（1998）的《“澳門學”芻議》<sup>⑤</sup>等文章就此展開討論。但回顧這二三十年以來的文獻，學科的內涵與外延還有待明確，系統性和規範性還有待完善，點和面的研究都有待深入，基礎性的研究也有待加強。

自2010年以來，在澳門基金會支持下，除定期出版的期刊和發佈“藍皮書”外，還有各種學術研討會，先後召開了六次“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屆2010年在澳門大學舉行，主題為“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和國際化”；第二屆2011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舉行，主題為“澳門

**作者簡介：**劉軍，澳門科技大學博士生、新疆財經大學副教授。

<sup>①</sup> 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港澳經濟》（廣州）1989年創刊號。

<sup>②</sup> 常紹溫：《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澳門學”問題》，《首屆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澳門：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年。

<sup>③</sup> 轉引自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8頁。

<sup>④</sup> 轉引自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8頁。

<sup>⑤</sup> 湯開建：《“澳門學”芻議》，《特區與港澳經濟》（廣州）1995年第2期。

學文獻調查和研究”，第三屆2012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主題為“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以澳門學為例”，之後改為每兩年舉行一次，第四屆2015年在澳門大學舉行，第五屆2017年在暨南大學召開，最近的一次2019年9月5日由澳門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聯同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和暨南大學合辦，這些學術活動為學者專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學”研究工作的進展。

### 一、文獻分析及輯要

以中國知網（CNKI）為平台，以“澳門學”為“篇關摘”進行檢索，得到結果45條（學術期刊26、會議3、報紙8、學術輯刊5、特色期刊3），刪除無效文獻12篇。對33篇有效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整體發文量較少（表1），指標分析偏低（表2），離理想狀態還有較大差距：

表1 “澳門學” 發文總體趨勢分析

發文年份	1986	1988	1989	1992	1995	1996	2000	2001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計
所選文獻	1	/	/	1	1	/	1	1	1	1	1	/	1	2	1	3	1	5	4	/	1	4	3	/	33
參考文獻	/	3	2	2	3	20	4	6	8	8	6	5	5	5	4	6	1	1	1	4	2	2	2	/	100
引證文獻	/	/	/	/	/	/	/	/	/	1	/	1	/	1	/	4	2	3	4	1	1	/	/	3	21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

表2 所選文獻指標分析

文獻數	總參考數	總被引數	總下載數	篇均參考數	篇均被引數	篇均下載數	下載被引比
33	152	29	4926	4.61	0.88	149.27	0.01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

相關的研究文獻不多且良莠不齊，內容也有交叉重複之處，這其中不乏必然因素，如有些研究成果發表於港澳地區或海外，未被“知網”及時收錄。但對“澳門”關注的不足，特別是對澳門文化地位的“忽視”應該引起學界重視。從時間和數量上看，回歸前後和回歸十周年的一段時間是研究的高潮階段，其後就一路走低，缺乏持久的耐力，同時暴露出基礎薄弱、合作不足，研究人才匱乏，尚未形成有效的研究團隊等短板。

“澳門學”文獻分佈及來源來看，“澳門學”還處於起步階段，成果有限，除期刊論文和少數專著外，還沒有相關的碩博論文，學科分佈也相對單一，還有很多新領域未涉及，無論是學者還是文獻來源都主要集中在澳門本土和周邊區域，除澳門基金會的資助外，還未見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然這些問題和“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夠明確，外延不夠清晰有一定關係。2020年澳門基金會開展以“澳門研究”為學位論文課題的研究資助計劃，不限學科領域，現正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都可申請，我們相信今後相關成果會越來越豐富。

以“澳門學”為主題進行檢索，除去無效文章（報紙短評），可讀文獻只有10篇左右，主要是期刊論文，還沒有相關的碩博論文（不包括著作）。“澳門學”這一概念自1986年提出以來，雖備受關注，但學界對有關學科建設的重大問題還認識不一。回歸後，澳門百業待興，學術界也迎來了黃金發展期，先後有很多學者為“澳門學”的確立作出努力，如陳樹榮、黃漢強、楊允中、金國平、吳志良、湯開建、林廣志、葉農等，其中既有澳門本土學者也有大陸學者，彼此的合作也在加深，可以說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澳門學”，為後輩學者作出了表率。我們選取其中的幾篇論文作為綜述，一窺“澳門學”發展的新階段。

徐新1999年在《澳門研究》（第11期）撰文《〈生存之道〉與澳門學》中認為澳門學可與敦煌學並列且毫不遜色。<sup>①</sup>他在接受中新社記者訪談時說：“敦煌是陸地絲綢之路，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澳門的歷史檔案、文化底蘊比敦煌更豐富，只是剛剛起步，猶如當初敦煌的藏經洞剛被發現。幸運的是，澳門保存得更好，含金量更高。”<sup>②</sup>黃漢強也認為“澳門400多年來沉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文化的基因，形成今天獨特的澳門文化模式，而這種文化模式對21世紀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意義”。<sup>③</sup>不管上述說法是否言過其實，但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鮮活的，且與時俱進，而敦煌學的研究對象都是塵封故去的，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

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回顧了“澳門學”創立的初衷和過程，<sup>④</sup>本文是作者在自己早期文章《關於建立“澳門學”一些思考》的基礎上的一次全面昇華，特別是針對“澳門學”研究對象的思考更加成熟和深刻，由“澳門社會”轉向“澳門文化”，並以“敦煌學”為例作出了對比。黃先生是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時任會長，也是“澳門學”的初創者和推動者之一，從宏觀層面積極構建“澳門學”的理論基礎，先後多次對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展開論述，步步深入，使以澳門這一地名創立一門新學科成為可能。

卓新平的《澳門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從澳門教會的建立、天主教發展、中國明清天主教學者和基督新教發展等方面來對“澳門學”所涵括的基督教研究加以闡述。<sup>⑤</sup>以宗教傳播為視角，闡釋澳門發展史與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密切關聯，並認為無論是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還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都以澳門為其入華傳教的第一站，因此取得了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應該成為澳門學不可或缺的部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是與宗教和傳教士密不可分的，所以宗教研究理應成為“澳門學”的重要載體。

林廣志的《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首先概括了有關“澳門學”概念的三種觀點，認為“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國際效應的綜合性學科”。<sup>⑥</sup>又從學術內涵、學科、時間、區域等不同特徵出發進行闡釋；第二部分以“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為題，對有關澳門研究的文獻作出介紹和梳理，指出澳門學是異質文明發展互動知識體系的“活化石”；最後談及澳門學的範式意

① 徐新：《〈生存之道〉與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1期。

② 轉引自嚴昌洪、湯蕾：《國內外城市地方學研究綜述》，《江漢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2期，第45—49頁。

③ 轉引自嚴昌洪、湯蕾：《國內外城市地方學研究綜述》，《江漢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2期，第45—49頁。

④ 黃漢強：《關於“澳門學”對象與方法的思考》，《學術研究》（廣州）2001年第7期，第34—36頁。

⑤ 卓新平：《澳門學與基督宗教研究》，《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4期，第73—80頁。

⑥ 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2—99頁。

義，總結為“澳門學的範式，必須具有相應的學術規定性，包括必須從全球視野、全球史的寬度和長度、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歷史和現實的‘延續性’、‘雙重性’、從本土知識系統的建構、以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來解讀和研究澳門文化等，更重要的是，這種範式必須得到學術界的充分論證，才能得到廣泛的運用”。<sup>①</sup>縱觀“澳門學”的相關文獻，此文具理論高度，邏輯清晰，論證充分，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的四位作者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都是澳門大學現任或前任教授，文章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全文分為學術基礎、學術內涵、學術範式及學術價值四個部分展開。作為學術基礎，“澳門研究從一開始就透着中國政治歷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觀因素……從最初產生之際就越出了澳門自身的內涵……基本停留在具體的研究課題層面，不足以支撐一門叫作‘澳門學’的學問”，就學術內涵而言，澳門學等同於“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所有知識系統”，遠超澳門本土，絕非一般意義的“地區學”；學術範式的獨特性“建立在澳門與世界之間所構成的文明互動的歷史範式基礎之上……以歷史和現實作為研究主體的澳門學……完全可以突破現有的研究範式，從文明互動、多元共存的社會歷史運作範式上建立自己的文化視觀和學術模型”；澳門學“具有世界文明史和文明交流史中不可忽略的學術意義和價值……須通過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通過跨學科的綜合比較研究，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和精神特質，並揭示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所蘊含的意義”。<sup>②</sup>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新也是最有理論分量的論文，解決一些說法不一的問題，很有說服力，也標誌着“澳門學”從初創走向成熟的過程。

吳宏岐、吳滿強、趙超的《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傾向認為，所謂“澳門學”的核心研究內容還應該是澳門的“文化”或“歷史文化”。介紹了澳門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澳門學“要想在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積極展開多學科整合研究勢在必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學科的先進研究方法固然需要借鑑，但徹底突破‘史地學’或‘沿革地理學’囿限，將澳門學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納入現代歷史地理學的視野，從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維度來分析探討相關問題，也是其中一個必要的、可行的研究路徑”。<sup>③</sup>有史有論是一個學科獨立的必然條件，所以歷史地理學是必須的研究視角，但認為“澳門學”研究的核心是“文化”或“歷史文化”，這種提法未免太過寬泛，而且“澳門學”的研究核心更應偏重活着的存在和未知的未來。

段世磊的《澳門學視角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述評》是一篇書評，以往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大多取材於中文和葡文文獻，且不完整，對於其他語種的材料則鮮有涉及，致使論證偏頗。“《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的作者則另闢蹊徑，從大量日文文獻人手，牽引出很多未被發掘到的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原始材料，為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作者追本溯源還原澳門聖保祿端倪時期面貌的努力來看，此書堪稱是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初創時期之研究最為系統完整且視域新穎的論述，在澳門學框架下將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推向了一個巔

① 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10年第6期，第92—99頁。

② 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第1—10、159頁。

③ 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安）2012年第4期，第35—40頁。

新的高度”。<sup>①</sup>聖保祿學院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地位不言而喻，“大三巴牌坊”更是澳門的象徵，所以對其加以研究是“澳門學”不可或缺的內容。

除了以上的期刊論文，還有不少學術專著也應該被認為是“澳門學”的研究文獻，如18世紀中葉由兩位澳門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從內容看，作為“澳門學”的早期論著沒有異議；湯開建先生積極推動“澳門學”的建立，在自己的著作《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一書中就以《“澳門學”芻議》作為前言，可謂用心良苦；2003年10月澳門文化研究會出版了劉月蓮女士的博士後出站成果《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為“澳門學”的深度和廣度都增添了不少內容；2018年1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澳門學研究叢書（第一輯）》，即金國平教授的大作《澳門學：探蹟與匯知》（暨南大學澳門學研究中心資助），全書收錄了金教授的十六篇新作，可貴的是金教授表示還有不少新作即將結集出版。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本土出版了很多有關澳門研究的期刊，其中《澳門研究》還定期推出介紹“澳門學”的專著。如此看來，有關“澳門學”的文獻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還有更多未被開發的資源亟待整理，當然這些是不是都必須納入“澳門學”的研究範疇還有待商榷，鑑於個人能力有限就不贅述。

## 二、澳門學的研究內容

“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是豐富的，但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內容還是有爭議的，似乎包羅萬象但又不能無所不包，這個問題在以上的論述中也有提及。“理想中的澳門學絕不應該是澳門研究的別稱，它已不再是研究領域與題材的框定，不再是研究對象與話題的凸現，而是有關澳門研究的一種學術的質的規定性的概括；理想中的澳門學強調的不應僅僅是特定的研究對象，不是有關澳門研究所有內容的迭加與整合，而應建構並提供獨特而又內在邏輯體系的有關澳門的學理認知系統；理想的澳門學不僅僅揭示圍繞着澳門及關於澳門的知識系統，更須呈現澳門知識系統所展示的歷史的、地域的文化特性和學術特性；理想的澳門學不應僅停留在有關澳門知識體系的特徵性概括，而應具有普泛性的概括，從世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視野取其內涵的價值能量，從而顯現其學術輻射力”。<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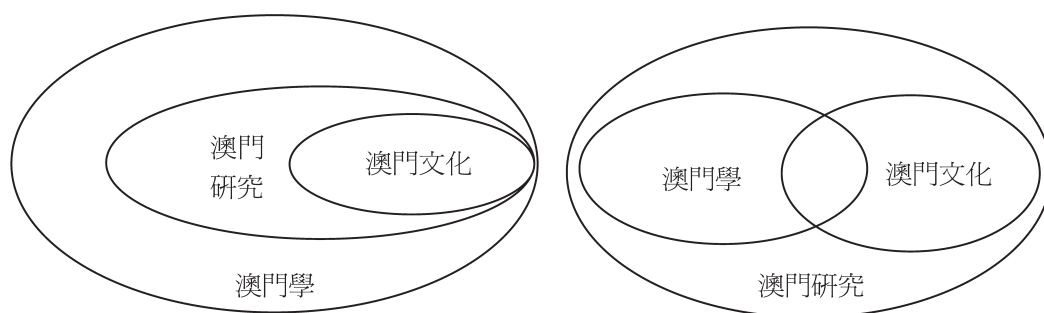
正如上文所言，澳門學的研究範疇確實不能僅僅是一個集合，而應是個系統，但先建立集合是完善系統的前提和基礎。任何學科的建立都應該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範圍，至於這個範圍是寬一些還是窄一些不是關鍵，因為範圍的確定是應該分階段分步驟地，不能一蹴而就。從長遠的宏觀角度而言，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文化三者之間應該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圖1左），即澳門文化 $\in$ 澳門研究 $\in$ 澳門學；但就當前而言，澳門學還處於建立之初，無論是理論基礎還是實踐外延都還比較薄弱，影響力也比較有限，現階段澳門學的研究目標要聚焦於澳門研究的核心和優勢上（圖1右），即澳門學和澳門文化的交集；吳宏岐、吳滿強、趙超也表達過類似觀點，<sup>③</sup>認為“澳門學”的核心研究內容還應該是澳門的“文化”或“歷史文化”。

① 段世磊：《澳門學視角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述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2015年第2期，第168—172頁。

② 郝雨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社會科學輯刊》（瀋陽）2012年第1期，50—54頁。

③ 吳宏岐、吳滿強、趙超：《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澳門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西安）2012年第4期，第35—40頁。

圖1 澳門學、澳門研究、澳門文化三者之間關係圖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澳門文化”註定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文化”的概念無論取廣義還是狹義，都是包羅萬象，無法一一展開。“澳門文化”是個很難界定外延的概念，僅以此為主題，在知網進行時間區間（1999—2019）檢索，共有文獻594篇（學術期刊407、學位論文23、會議論文26、報紙文章16、學術輯刊23、特色期刊99）。<sup>①</sup>整體看，主題分佈比較平均，“文化交流、語言文學、旅遊、建築與工程、國內外政治”佔居學科分佈前五位，把檢索區間擴到最大化（1988—2021），學科分佈的前五位基本沒變（只有“國內外政治”被“民族與地方史志”替換），由此可以體現出“澳門文化”研究的學科內容基本穩定（表3），反映了研究的基本趨向。另外，從成果貢獻的機構分佈來看，主要是澳門本地的高校以及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

表3 澳門文化研究學科分佈（1999—2019）

類別	文化	中國文學	旅遊	建築與工程	政治	民族與地方史志	經濟	其他	合計
數量（篇）	184	45	42	40	32	32	28	226	629
佔比（%）	29.25	7.15	6.68	6.36	5.09	5.09	4.45	35.9	100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中國知網”的可視化分析數據自製。

\* 因類別統計時有交叉現象（如部分文學也算文化等），但也無法一一區別，而文中是按期刊類別統計所以無此現象，特此說明。

總之，澳門學的研究重心應該落在“跨”和“融”上，“跨”包括跨地區、跨領域、跨時空、跨文化，這基本已經達成共識，“融”也要及時跟上，政策融、經濟融、教育融、文化融等。研究目標要區分短期、中期、長期，一步步有計劃地去實現，現階段研究的重點應該是“文化”，除“歷史文化”外，還有當代文化的融合發展問題，努力使澳門文化成為可口的“濃湯”而非簡單的“拼盤”。

### 三、建議與不足

“澳門學”研究中，雖然還有很多概念和界限尚未釐清，但要健康發展都離不開內外環境的

① 數據來自中國知網：<https://kns.cnki.net/KNS8/AdvSearch?dbcode=SCDB>，2021年3月30日統計。

制約，特別是不同語境下的研究角度，處理好以下幾種關係應有助於探究“澳門學”新的研究路徑，構建體系，掌握話語權，解決實際問題。

### （一）澳門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這組關係是所有關係中最重要、最悠久的關係，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是合集與子集的關係，無關優劣，但關係“本末”，最能直接體現“一國兩制”的關係。“一國兩制”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體現了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本末”之辨。“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異”。<sup>①</sup>“澳門學”應該多着眼兩者“異同點”的比較及相互的影響。澳門“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徵正是中華文化精髓的具體體現，所以加強中華主體文化在澳門的認同，強調國語（普通話）的法律地位，強化公民教育始終不可或缺。

### （二）澳門與港台的關係

澳門、香港、台灣的關係是交集的關係，對大陸同胞而言，又常常被認為是一體的關係，特別是港澳關係始終被捆綁在一起，這種誤解主要源於政治體制原因，對澳門不利，幾乎淹沒了澳門的存在。澳門對香港的關係由競爭轉為過依，主要原因是香港在面積、人口、經濟、教育、文化、國際地位與話語權等各個方面都佔盡優勢，尤其是回歸前，香港可謂一枝獨秀，澳門總是蹲在這顆“東方之珠”的光環下不被世人重視。從兩者文獻研究的主題也可以看出，有關香港的研究更顯“大氣”，金融、商業、國際化等特色顯著，而澳門的相關研究難以擺脫香港的“影子”，使澳門——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始源地沒能彰顯特色，文化地位被大大降低。就港澳文化研究的主題對比來看，澳門文化研究的多樣化屬性明顯多於香港文化，不僅有文學等共同的內容，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更是搶眼，涉及基督、天主、媽祖、儒釋道等多元一體的文化環境。這一點也印證了劉月蓮博士關於將澳門建成文化特區比建成經濟特區更有價值的建議。

澳門不應滿足於緩衝、仲介、後補等類似角色，應該加大話語權，提高主動性，勇敢發聲，講好澳門故事，使澳門文化的優越性走向國際舞台，使“澳門學”的研究盡快走進學術研究的中心。

### （三）澳門與葡語系國家的關係

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或者通用語的國家和地區有十個，是2.4億人的共同母語，也是世界第六大語言。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義大利語都由拉丁語演變而來，拉丁語是歐洲以前的通用語，目前很多學術領域仍然使用相關術語，且整個拉美的語言幾乎都同屬一個拉丁語族。從研究角度分析，“澳門學”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獻檔案，數量龐大無法統計，不僅涉及到葡語，還包括拉丁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等多種語言的原始材料。亟待搜集、整理及翻譯，相關的對比分析也有待加強，更應該吸引葡語系甚至拉丁語系的更多學者積極投入到“澳門學”的研究中來。

澳門作為連接中國與葡語國家、拉美國家的橋樑和紐帶，為促進中外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繼續發揮獨特作用。葡語是拉丁語系的一個語種，與包括西班牙語在內的其它拉丁語種有着不少共通之處，使得澳門成為促進與拉丁語系地區交流合作的理想平台。澳門現代文化自帶葡國（拉

<sup>①</sup> 《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發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2018年11月12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K0lQp>。

丁)屬性,土生葡人更是這種多元語言文化的“集合體”。澳門要面向未來,要在“一帶一路”願景中做主角,有擔當,不僅僅要做經濟貿易的橋樑,更要肩負起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

#### (四) 澳門與大灣區(珠海)的關係

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澳門要明確定位,發揮所長,錯位發展,借道超車,把握好“一國兩制”的特殊政策,做好經濟轉型和文化保護工作。背靠粵語文化圈,如何在提高話語權的同時不被同化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特別是要深挖澳門粵文化的特質以及流變過程。“澳門學”不只是澳門自己的事,也不應局限於澳門一地,雖然內地一些大學也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如暨南大學的“澳門學研究中心”,部分內地學者也加入其中,但這還遠遠不夠。

面對珠海的崛起,澳門該如何自處,是高興還是擔憂?澳門與珠海的關係是競爭與合作並舉,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會不會複製香港和深圳的關係,還不得而知。澳門如何在經濟上防止被虹吸捲入,避免再一次被動依附,這是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相較珠海,澳門的優勢不在經濟,而在文化,大灣區也不僅僅是經濟的灣區,更應是文化的灣區,澳門如何在經濟上合作,在文化上舉旗,才是“澳門學”未來認真思考的課題。

#### (五) 澳門內部不同族群的關係

澳門匯集了包括五大洲的不同地域和國籍、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體徵的各種族群。2019年澳門人口已達67.96萬,比2009年(53.34萬)增長了27.4%,外地僱員增加至19.65萬人,比2009年(7.49萬)增長162.3%。按行業分析,博彩業(包括博彩仲介)和酒店及飲食業從業人口近15.3萬,比2009年(11.7萬)增長30.8%,<sup>①</sup>增長最快,流動性也最強。澳門的定居族群中,雖然華人(含港台)佔九成以上,但構成也很複雜,加上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的外族人口及土生葡人,還有眾多不同族裔交叉通婚的後代,更是難以統計。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認同和信仰習俗,特別是外籍族群抱團現象明顯,在好的生存環境下矛盾容易被掩蓋,一旦經濟或政治環境出現波動,很容易出現階層和族群的分化及衝突,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背景是矛盾產生的內因。

#### (六) 建議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澳門學”是“米”太多且源源不斷,現在急缺的是“巧婦”。所以,專業人才的培養是重中之重,培養出來的人才要像澳門文化一樣,既博雅又精專,可以考慮在大學內設立相關專業或研究方向,構建人才培養的基地,如澳門大學已設立“哲學碩士學位(澳門研究)課程”,培養層次以碩博為主,人員構成要多元,吸引全國乃至全球的優秀人才加入;其次,學術平台的搭建也是當務之急,雖然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幾個研究中心,但這還遠遠不夠,平台也應該體現多樣性和跨學科性,要加大學者間的合作和文獻間的互引,這樣才能相互借鑑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使成果不但豐富而且有營養,“澳門學”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凌亂的“拼盤”;最後,還需致力於傳播力的提升,“澳門學”應該屬於世界,知道的人多了,感興趣的人就會增多,研究的人自然也會隨之增多,使“澳門學”成為真正的“顯學”。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統計年鑑》,2020年,第49、77—78頁。